

清末四公子

高 阳 著

前 言

同光年间的政风,与康熙末年相近。以我个人的看法,清圣祖将地方官分为六等:爱民、干练、清廉、不好名为第一等;爱民、干练、清廉为第二等;爱民、干练、虽贪不苛为第三等;清廉、才具平常为第四等;才具平常、操守不佳,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;贪污无能兼而有之,则为第六等。在圣祖心目中,汤斌不过第二等人物,即因误认汤斌在江苏巡抚任内,有与帝争名之意。张伯行号称“天下清官第一”,其实,圣祖视之为第三等人物。他曾说过:张伯行喜欢刻书,哪里来的钱?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。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。由此可知,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;上谕中屡次表示,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,有益于民,享用稍过,不足为罪。至于用人,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,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,第三等以上则必蒙温旨褒奖了。

同光朝慈禧太后当政,识人、用人虽不及圣祖,而想法大致相近。因此,在那时候的地方官,自督抚至州县,收陋规以及三节两寿(本人及太太)收礼,视为当然;卖官鬻缺,营私舞弊,只要不太过分,不得罪“都老爷”,亦可无事。举个例,《能静居日记》作者赵烈文,据沈云龙教授记其生平,同治八年为曾国藩奏调赴直隶,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,在任一年七个月,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隶州知州,至光绪元年去职,在任三年有余,前后并计,不过做了五年地方官,而自光绪元年九月回南,“隐于乡里,大治园林,广置姬妾,颇娱声色之好,以迄逝世。”赵烈文歿于光绪十九年六月。五年作吏,廿载坐享。烈文犹为贤者,尚是如此,他人可知矣!

至于京官,贿赂公行,亦无足为奇。翁同龢日记中,常记某人馈赠,

“受之”或“却之”，大致受者多而却者少。翁同龢尚且如此，孙毓汶之流可知矣！

因此，同光年间，袭父兄余荫，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、无一不好的“大少爷”；今有达官之子，或则胸怀大志，卓尔不群，或则真慕风雅，诗文有声，与酒食征逐的纨绔，大异其趣，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。“清末四公子”即以此得名。与“明末四公子”相较，文采相若，风流未逮，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求之今日，亦戛戛乎难哉！

“清末四公子”者，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嗣同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三立，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，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。或以为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模之子葆廉。要之，谭陈必在其列，断无可疑。兹请先谈陈三立。

目 录

陈三立 员

丁惠康 员愿

谭嗣同 员怨

吴保初 员愿

陈 三 立

陈三立字伯严，别号散原。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，一名南昌山。据《水经注》即古散原山。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，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，因以散原为号。

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，即今修水县。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，故名分宁，宋沿旧名，元、明、清改称宁州，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，入民国后又改为修水，称义宁者不过百年，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。

此地曾出一大诗人，即宋朝的黄庭坚。《嘉庆一统志》载：

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，双井北岸，有永思堂，旁有钓台，下有水曰“明月湾”。

黄庭坚是“江西诗派”的开山祖师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及《云麓漫钞》，皆载吕本中所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，成为宋诗的代表。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，黄庭坚及二陈——陈师道、陈兴义的高处，原在“文章自得方为贵”，只以浅夫妄人，凡无病呻吟，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，皆遁入江西诗派，致自金、元开始，即为世所诟病。直至清末，张之洞犹有“江西魔派不堪吟”之叹。但散原之出，大昌了江西诗派，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程，八百年先后辉映，即此已足不朽。

散原的尊人陈宝箴，字右铭，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，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入阁拜相，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，皆为难能可贵之事。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，其时洪杨之祸，已成燎原，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，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，落第后留京读书。

黄秋岳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记：

初先生庚申(按：庚申为咸丰十年，所记有误)，会试落第，留京师三岁，得交四方雋雅之士，于易佩绅、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，时称三君子。会咸丰北狩，先生条防守六事，上枢府，适当道忧，通州仓米为寇掠，骤无所为计，先生曰：“设传驼更运，前明于忠肃成法也。”由是旦夕毕移辇下。一日饮酒楼，遥见圆明园火光，因捶案大哭，尽惊其坐人，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，遂归湖南，易以前受骆秉章檄，募千人号“果健营”，防来凤龙山间，罗副之，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，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，死守累月，粮且尽，先生独身间走沔州永顺以募饷。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，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。

见其单絮衣，乃取狐裘覆之，先生却曰：“军士冻饥久矣。”即“何忍独取暖为”？张为流涕，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，得即持去，守益坚，石不得逞，引去。

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，咸丰十一年八月，曾国荃克安庆，曾国藩自东流进驻。平洪杨的军务，至此始有把握。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：

曾文正公大治兵，用两江总督屯安庆，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，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，遂往游，曾公引为上客，喜过望曰：“海内奇士也。”幕僚亦争交权，相引重。李公鸿裔专幕职，尤挟府君得代己，府君雅欲亲战事，谢去，就席公宝田江西军，道彭泽鄱阳间，饥民连数县，赈者率应故事，势且尽毙，府君惻然，就逆旅斋沐起草，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，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，凡数事。中言“赈而不能活，犹弗赈；活而不能久，犹弗活。”沈公感悟，大发帑全济无算。其时江西为寇冲，蔓延郡县，余军多观望，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，席公自府君至，累用奇策决胜，然寇方蚁集，势盛，而席公

军单，沈公席公又颇乖隔，不相能，每军牒往还，席公辄取抵地曰：“吾死此文法吏矣！”府君笑曰：“沈亦贤者，坐不知公耳。”因谒沈公，极陈席公沈鸷，“必能用智略平寇，胜艰巨，明公当开布腹心，席必为尽死，不则席败，大局危，公安所惜足乎？”沈公以为然，立增席公五营，遗书披诚相拊慰！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，卒以残寇，竟大功。

右铭善于调停。曾国藩与沈葆楨因争饷而生嫌隙，亦赖右铭一言而解。朱克敬《瞑庵杂识》记其事，极为生动：

曾国藩移军安庆时，与江西巡抚沈葆楨约厘捐均归大营，有事则分兵回救，既而江西寇四起，曾军益东，葆楨惧救不时至，上疏请留厘金养兵，诏许之。藩疑葆楨卖己，绝不与通，葆楨以书谢，亦不答。会陈右铭游江南，闻之往见国藩，从容言曰：“舟在遇风，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；父子兄弟若不相容。须臾风定舟泊，置酒慰劳，欢若平时，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！”国藩曰：“向之诟惧舟之覆，非有私也。舟泊而好，又何疑焉？”右铭曰：“然！曩者公与沈公之争，亦惧两江之覆耳，今两江已定，而两公之意不释，岂所见不及船人哉？”国藩大笑，即日手书付沈，为朋友如初。

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，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、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，是岳麓书院同窗。洪杨事起，皆从江忠源援赣，十年转战，不出江西，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。《中兴将帅别传》卷二十三，记曾国荃克江宁后，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，自皖南，经浙江开化，入江西玉山西行，为席宝田所获事：

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，合贼众万余人，由皖边出开化、玉山西行，遇别将扼战，走泸溪斜趋山谷间。九月，公遮之于新城，已遁；

遂率轻兵疾追，数昼夜犹不及寇。军士久疲，议休止，公曰：“洪福，寇倚以号召，行与瑞金寇合，不可得矣！寇奔逸数千里，日夜疾行，辎重妇女相随属，见无追军，惫甚，行必缓，我亟趋间道，要击广昌、石城间，寇可灭也。”仍勒军传餐而进，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，危崖阻纡数十里，日向暮，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。公怒曰：“渡岭冠即是，奈何懈军心耶！”令斩以徇。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，平明岭尽，果见寇，方炊，寇亦顾见，因骇奔。我军呼啸压击，俘斩过半，遂擒伪王洪仁玕、黄文英、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，而洪福脱免。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，语其曹曰：“小天王过此矣！”辛酉，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，果洪福也。

按：泸溪今名凌溪，其南新城，今名黎川，而席军所驻的金谿，则在泸溪西北，自金溪南下至建昌，趋东南则为新城，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，皆有大路。席军在新城拦截未获，洪军拟由山路入瑞金，则计惟抢先一步，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，始为上策。据散原述其父行状，建此策者即为右铭。

此役叙功，巡抚沈葆楨得头品顶戴、一等轻车都尉，席宝田赏云骑尉、黄马褂，陈宝箴叙知府，超授河北道，驻河南怀庆府。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，因事免官，至光绪十六年，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，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。

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。其时清流之势正盛，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。宝廷主试福建，经富春江入闽，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，归而自劾，即李蕤客诗：“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这一重公案。

这一科，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，散原则在江西获隼，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。郑孝胥海藏楼诗，陈宝琛沧趣楼诗，并为近世诗坛大家。二陈师弟的酬唱，尤称佳话；《一士类稿》中《谈陈三立》一文记：

光绪八年壬午，陈宝琛典试江西，散原为所得士，深邀鉴赏，师弟之谊颇笃，晚年情感尤挚。八十生日，宝琛赠诗云：“平生相许后凋松，投老匡山第几峰？见早至今思曲突，梦清特地省闻钟。真源忠孝吾犹敬，余事时文世所宗。五十年来彭蠡月，可能重照两龙钟？”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。诗之首句：本事即在壬午闹中。洪钧（同治戊辰状元，宝琛同年友也）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，与宝琛论取士之法，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，以符“春风桃李”之旨。宝琛则谓宜以“岁寒松柏”为尚，遂以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命题，入彀者多知名士，散原与焉。“平生相许后凋松”，五十年往事重提也。（此诗初稿，本以“相期无负后凋松”之句切壬午之遇合，曾为陈苍虬诵之，后经改定写赠。）民国二十三年，散原北上，省其师。师年八十七，弟年八十二，皤然二老，聚首旧都，共话啣曩，盖欢然亦复黯然云。翌年，宝琛卒，散原挽以诗云：“一掷耆贤与世违，猥成后死更何依，倾谈侍坐空留梦，启圣何天竣见几。终出精魂亲斗极，早彰风节动宫闈，平生余事仍难及，冠古诗篇欲表微。”语极工练沉着，于琛宝生平暨本人关系，均道得出，可与宝琛赠诗合看。并挽以联云：“沆瀣之契，依慕之私，幸及残年偿小聚。”“运会所遭，辅导所系，务摅素抱见孤忠。”亦甚挚切。

陈宝琛赠散原一诗，与其前后“落花”诗，皆为脍炙人口之作。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，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，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。“真源”一联，概括散原生平，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，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。

按散原晚年每居庐山，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，而有“投老匡山第几峰”之句，结句照顾起句，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，一唱三叹，摇曳生姿。散原挽诗“平生余事仍难及”，即由“余事诗文世所宗”

而来。生死酬唱，不以幽明见隔，昔人诗格之谨，诚不可及。

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。会试中式，在殿试以前，犹称“贡士”；必待殿试登榜，始正式成为进士，以主事分吏部行走。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：

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，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，以宾礼接见；书吏亦昂然自居。继知其为部胥，乃大怒，厉声挥之出。书吏惭沮而去，犹以“不得庶常，何必怪我”为言，盖强颜自饰之词，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？部吏弄权，势成积重，吏部尤甚，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，实大悖体制，散原折其僭妄，弗予假借，亦颇见风骨。散原非无经世之志，而在部觉浮沉郎署，难有展布，未几遂愉然引去，侍亲任所。其父右铭翁（宝箴）在湖南巡抚任，励精图治，举行新政，丁酉戊戌间，湘省政绩烂然，冠于各省，散原之趋庭赞划，固与有力。

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，所谓“浮沉郎署”，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。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，复起为湖北臬司。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。光绪二十年散原擢直隶藩司，清史稿本传记：

二十年，擢直隶布政使，入对。时中东战亟，见上形容忧悴，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，以期变不失常。他所陈奏语甚多，并称旨。上以为忠，命治精台。专折奏事。《马关和约》成，泣曰：“殆不国矣！”

甲午之役，凡清流无不主战。主之者内则翁同龢，外则张之洞。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，兼置江督。散原时居武昌，特以一电致张，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。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载其事云：

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,以《马关和约》签定,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,此电南皮未作复。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,而散老忠愤所迫,不遑顾虑,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。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,故甄录不敢遽及。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,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,有云:“马关定约,和议成,府君痛哭曰,无以为国矣,历疏利害得失,言甚痛。”观此,则对和约之不满,义宁乔梓,固一以贯之。

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,又别有说。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又记:

行状又言:“其时李公鸿章,自日本使还,留天津,群谓且复总督任。府君愤不往见,曰,李公朝抵任,吾夕挂冠去矣。人或为李公解,府君曰:“勋旧大臣如李公,首当其难,极知不堪战,当投闯沥血自陈,争以死生去就,如是,十可七八回圣听,今猥塞责望谤议,举中国之大,宗社之重,悬孤注,戏付一掷,大臣均休戚,所自处宁有是耶?其世所蔽罪李公,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,卒不往。”得此一段,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,盖义宁父子,对合肥之责难,不在于不当和而和,而在于不当战而战,以合肥之地位,于国力军力知之褻审,明烛其不堪一战,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,下怯于书生贪功之高调,忍以国家为孤注,用塞群昏之口,不能以死生争,义宁之责,虽今起合肥于九泉,亦无以自解也。信繇斯说,则散原当日之愤激,自在意中,固卓然可存。原电云:“读辄电愈出愈奇,国无可为矣,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,力请先诛合肥,再图补救,以伸中国之愤,以尽一日之心,局外哀鸣,伏维赐察。三立。”按散老此电,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,戌刻至江宁者。

以右铭、散原父子的性情,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,为理所必有。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,本无为人作排李前驱之意,但

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,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,皆欲排去李鸿章,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,适足为翁、荣二人进言之资,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。

按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,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,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,历时二十二年之久,任内手创北洋海军,统辖淮军数十万,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,军权、财权、外交权,几乎双手尽握。一旦解任,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。因而以盛宣怀为首,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,而卒无成,则清流的攻击,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,而右铭的愤激态度,实为决定性的因素。

翁李不协,其来已久,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,性情亦颇平和,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“对事不对人”,故对李之回任直督,犹非坚决反对。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,及今观之,意向灼然可见。

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,早萌于甲午年间。其时翁同龢得君正专,益以张荫桓对洋务、财政的熟练,所以平章国事,举措由心,除非光绪特述“慈圣”之意如何如何,否则,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。至于对荣禄,视之蔑如,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,均无发言余地,此实为荣禄所难堪。因为论资望,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户部侍郎,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,论私谊,彼此是金兰之交,从哪一方面看,翁亦不当目中无人。

大致后党媒孽帝党,往往运用“打狗看主人面”的逻辑,所以对翁之蔑视,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,往往以“翁同龢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”为言。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。以慈禧之老练、荣禄之深沉、李莲英之阴柔,对朝局洞若观火,翁外恃清流,内结荫桓,复奉恭王之名义,挟天子以令诸侯,势莫与伦,计惟得一强藩,隐握兵权,缓急之际,方可举兵入清君侧,投清流于浊流之中。是故荣禄之觊觎直督,可说已非一日。

但李鸿章非翁同龢之比，所以荣禄决不敢轻举妄动，甲午战败，排李是一绝好机会，但仍出之以极端谨慎，因恐打草惊蛇，帝党会存戒心。更怕翁、李化敌为友，合力应战，故以王文韶由云贵移署直督。

用王文韶是荣禄所下的一着绝妙好棋。王文韶亦我杭人，《官场现形记》送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琉璃蛋”，照杭州人的俗语，便是“油煎枇杷核”。如此圆滑，自然不会翻前任的案，此所以安抚李鸿章。

同治年间，朝中有南北之争。北派奉李鸿藻为盟主，南派以沈桂芬为依归，壁垒分明，互为消长。王文韶为沈桂芬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主考的门生，光绪四年沈援王入军机，署兵侍，补礼左，兼在总署行走。其时军机由恭王领班，其下四大臣两满两汉，两汉即沈、王；两满则协办大学士宝鋆、户部尚书景廉。宝鋆为恭王密友，与沈投契，景廉则谨防君子，无所作为。此时军机处谓之为沈桂芬一把抓，亦无不可。

光绪六年正月，李鸿藻服阕复起，仍值军机。但孤掌难鸣，惟恃清流唱反调为牵制之计，恰如今之民主国家在野党之所为，国家大政，固犹在沈桂芬手中。

不意南派势力方盛之际，沈桂芬于这年除夕病歿。王文韶虽在南派，素为南士所轻，不足以承沈的衣钵，于是北派大举反攻，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罢官，南派自此消沉。直至光绪亲政，翁同龢大用，接沈之余绪，复树南派之职。王文韶在基本上是南派，用他，亦所以安抚翁同龢，并松弛其戒备。

王文韶与陈右铭是旧交，加以荣禄正在罗致人才，有意将右铭收入夹袋，因得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，由直藩简放为湖南巡抚。

湖南巡抚本为吴大澂。此人为潘祖荫门下士，金石名家，而居官则以功名心热，有许多笑话。光绪六年随吉林将军铭安，办理西北边防，得一铜印，文曰“度辽将军”，大喜。在湖南巡抚任内，喜欢用洋枪打靶，曾三射中鹄，益以为文武兼资，可总师干。

甲午战败，朝廷以淮军不可恃，思复用湘军。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授

为钦差大臣，督办东征军务，驻山海关。吴大澂亦自动请缨，率湘军宿将湖南藩司魏光燾等，开赴关外，受刘坤一节制。吴大澂开拔时，意气轩昂，王壬秋作游仙诗五首，于吴及其僚属，佛致讥讽。按王壬秋游仙诗，自作注解，而前后不同。笔者得观王诗亲笔之影本，录之如下（括弧中为自注）：

（一）湘瑟秋清更忤弹（湘抚吴，于秋闹前匆匆启行），只言骑虎（余虎恩先求充营官，后不受节制）胜骖鸾。东华旧吏（黄自元）犹簪笔，南岳真妃（魏藩台）肯降坛？叔叔倘凭金换骨（曾钊广拜门生），陈平何用玉为冠（求贤馆诸生）。淮王自是能骄贵，却被人呼作从官（刘坤一总统诸军）。

（二）只学吹箫便得仙，霓旌绛节领诸天（江督刘授钦差大臣）。应知吴质难成梦（吴清卿先生，亦归节制），不与洪崖更拍府（李鸿章在关内，亦兼受节制也），金阙乍辞初授篆（时又遣张荫桓议和），神山欲望恐无船（铁甲皆毁，惟存木壳）。鸣鸡夜半空回首，惊怪人间尚早眠。

（三）新承凤诏出金闾（陈裕三），争看河西坠马郎（先守黄河，闻贼至称坠马走去）。幸不倚吴持玉斧（吴抚欲节制之，陈不受也），可能窥宋（宋庆在前敌）出东墙，劳拖仙带招燕使（张野秋因陈被劾为李鸿藻所唾骂），只借天钱办聘装（陈三长子克扣饷银二万）。曾受茅君兄弟诀（曾文正），休将十赉损华阳。

（四）郁金堂内下重帟（江督衙门最深邃弘敞），玉女无眠但掩扉（张制台不睡不见客，此二句活画）。尘暗素书长自读，月明乌鹊定何依（张之万、额勒和布皆撵出），蛇珠未必能开雾，鸳锦犹闻劝织机（机器局昼夜防守）。莫道素娥偏耐冷，为天寒透五铢衣（余饮督署出时已五更）。

（五）东华真诰有新封（王文韶也），朵殿亲书御墨浓。眉妩莫

描张(之万)敞笔, 额(额勒和布)黄犹待景阳钟, 仙家往事如棋局, 夜宴来时带酒容。青雀定知王母意, 几时瑶岛驾双龙。

上引五诗, 第四首咏张之洞, 时署江督, 壬秋曾访之于江宁。第五首则咏战败后之部署, 王文韶署直督, 军机大臣张之万, 额勒和布出军机, 李鸿章赴日议和, 所谓“青雀定知王母意”者, 李赴日之前请训, 得慈禧密谕, 和局只许成, 不许败。此外三首, 所讥湘淮军宿将, 据沃丘仲子《近代名人小传》, 略作简介:

(魏光燾)字午庄, 邵阳人。初为人司庖厨, 继从左宗棠军征新疆, 擢至道员, 历方面。甲午, 率旧部援辽, 驻军牛庄, 日师将至, 全军望风溃逃, 至析木城, 方炊, 闻猎人枪响声, 误为敌军, 弃炊具奔, 一日夜达三百里, 光燾坠马伤足, 血涔涔, 不自知也, 至锦州魂乃定。明年, 竟擢陕西巡抚。

余虎恩以湘军而曾隶左宗棠部下:

虎恩以武荫从左宗棠征回, 并两世职封三等男爵, 授汉中镇总兵, 以获贼中窖金致巨富告归。甲午, 从吴大澂御日无功, 后以万金贖荣禄, 留武卫中军, 令统十营。

陈裕三为陈湜所叙特详, 则以陈秀才, 又为曾国荃姻家, 与行伍出身者不同, 所谓“曾受茅君兄弟诀”者, 故持论较苛。陈湜初入军营, 本为文职, 偶以营官患病, 代为传令, 无意中获一长毛, 搜身得洪秀全下陈玉成檄文, 尽知“天京”防守之状, 曾国荃大喜, 重以姻娅, 立保同知, 因而起家。

亦就是以此渊源, 陈湜成了曾国荃的心腹, 曾在前线, 往往委由陈

澁看守老营 ,以致军功的保案中 ,总有他的名字 ,而实无赫赫战功 ,居然在光绪中“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”时 ,亦得滥竽其间。

陈澁早在同治四年 ,就已当到陕西按察使 ,后调山西 ,剿捻时 ,受命驻汾州 ,节制文武 ,结果仍让捻匪张总愚窜入山西 ,因而获罪。沃丘仲子《近代名人小传》记 :

积功晋臬司 ,以剿捻防山西。澁素渔色 ,军纪不饬 ,至晋久无功 ,乃饬提以闻 ,论罪遣戍 ,后释还。再赞左宗棠军 ,授江宁藩司 ,乞病假。甲午特起防辽 ,卒于军 ,视巡抚例议恤。澁开爽长于应敌 ,问机立断 ,以荒于色 ,晚岁致腿疾 ,不良于行。

此记与清史稿本传对看 ,有数处不符 : (一)陈澁复起在光绪十二年。其时曾国荃为两江总督 ,奏请以陈澁“统水陆诸军 ,复出统南洋兵轮 ,总湘、淮诸军营务 ; (二)复起授职臬司 ,非藩司 ; (三)甲午特起防辽 ,先屯鞍山 ,至第二年初春 ,防守摩天岭的聂士成 ,调回关内 ,拱卫畿辅 ,由陈澁接防 ,未几和议即成 ,陈澁竟“因功”升为江西藩司 ,第二年方去世 ; (四)陈澁的腰疾由坠马而致。

所谓“只借天钱办聘装”何来 ? 湘绮原注 :“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” ,及至收入湘绮诗第三种《杜若集》 ,则此句之下已改注 :“卫汝贵领饷六十万 ,以十万寄家 ;如曹克忠辈十扣四五 ,较为廉洁 ,勿怪哭菜市也。”按 :卫汝贵扣饷十万寄家 ,乃为其女妆奁之资 ,故云“办聘装”。清史稿本传 :

卫汝贵 ,字达三 ,安徽合肥人。从刘铭传征捻 ,累迁至副将 ,晋总兵 ,事平 ,授河州镇。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 ,留统北洋防军 ,历授大同、宁夏诸镇 ,均未之官 ,统防军如故。光绪二十年 ,日朝战起 ,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 ,临行 ,鸿章诫以屏私见、严军纪。至牙山 ,